Weekly 株洲日报 文化周刊
文化广场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坚
校对:马晴春
电话:28823915

株洲记忆

市档案馆珍藏一份“镇馆之宝”

龙泉村和周总理的特殊缘分

宁 翔

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奖状

易国华手捧国务院奖状合影(作者翻拍)

株洲市档案馆珍藏了一张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奖状，极其珍贵，可以说是“镇馆之宝”。说他珍贵是当年全国荣获此张奖状的只有10个单位，湖南就占了2个，一为郴州汝城县三星镇树园村，另一则为株洲郊区人民公社龙泉大队（现芦淞区龙泉街道龙泉村）。

在芦淞区龙泉村村部党员活动室的墙上，一张由周恩来总理亲笔署名签发的“奖给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湖南省株洲市郊区人民公社龙泉大队”国务院奖状镶在一面洁净的玻璃镜框里。龙泉村党组织书记介绍，数十年来，这张奖状一直激励着龙泉人奋发向上……当然，这张奖状是在原件上翻拍出来的，正品一直珍藏在株洲市档案馆内。

龙泉往事

据悉，50年代，株洲郊区人民公社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又得城郊结合部的地利之便，生产生活条件远胜于其它公社。公社所辖龙泉大队有15个生产队，共1800多人，土地包括山林800多亩，主要供应市区的蔬菜渔产。

据说，当年的龙泉大队支部书记名叫殷寿田，副书记叫殷正湘、易先述。大队在他们的带领下，队员们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心血灌溉泥土，用汗水滋养作物，争相投身建设生产，抡起锄头挑起扁担，憋起袖子拼力气，挥洒青春与汗水，将这片土地当成了“家”，花费精力去经营，对每一株苗、每一颗种都细心栽培，希望它们茁壮成长，期待丰收时刻的到来。

1958年，他们获得了丰收，12月，国务院授予株洲市龙泉大队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奖状也被镶打装裱送到了公社。

大出风头的龙泉冬瓜

还未等社员们从如梦般的惊喜中缓过劲来，另一个好消息又随之而来：龙泉大队二队队长易国华因研制龙泉冬瓜成功，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956年初，龙泉大队易国华开始进行广东冬瓜与本地笋瓜的杂交配种试验。经过两年的艰辛，试验取得了成果。冬瓜配笋瓜，结出龙泉瓜。长出的龙泉瓜像一头头小牛崽，大的有120多斤。龙泉冬瓜，比其他的冬瓜好。好在主蔓长，长势好，叶片大，耐热，耐肥，抗病，产量高。更好的是肉心厚，肉质松软，水分多，品质好，味道佳。

龙泉冬瓜研制成功的消息飞到北京，周总理非常高兴，易国华也有幸代表大队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大会，并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周总理亲自接见了易国华，握着他的手，边笑边勉励他继续努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很多年过去，不少人都忘记了易国华的名字，但提起“三芳模”，上了年岁的龙泉人都晓得，概因易国华在家中排行老三，当时的人都亲切地称之为“三芳模”。易国华于1999年12月逝世，享年81岁。

永久的追忆

尽管事隔多年，上了岁数的龙泉老人都还记得1959年的10月1日，建国十周年纪念日，株洲市举行大型庆祝活动，龙泉大队作为全国的一面红旗，制作的游行彩车特别醒目，彩车上放着国务院颁发的奖状，还有易国华种植的冬瓜，以及大队各种农副产品。作为全国劳模代表，易国华身披大红花，屹立在彩车上，获赠了无数鲜花与掌声。

十里长街，总理犹在。每每忆起周恩来总理，人们总是饱含深情，从雄关漫道的峥嵘岁月到激情燃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总理给人民留下太多感动和无限敬意。虽然当时的人与物已渐行渐远，但对于株洲人，尤其是龙泉人来说，这份敬意和感动更凝聚成一种持之以恒的力量，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延续至今，那片土地传承下来的勤劳拼搏的精神却经久不衰，推动着株洲人奋力前行，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弘扬“火车头”精神，奋力实现“两个走在前列”，对株洲人来说，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承载着深刻的历史底蕴，发自肺腑的一种决心和斗志。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从龙泉冬瓜到芦淞区两大“千亿产业”集群，到株洲市“一谷三区”建设，株洲人一直铭记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教诲，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信念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推动着株洲砥砺前行、行稳致远！

唐湘子的故乡情

温 琳

9月21日，唐湘子情系家乡书画艺术汇报展在神农大剧院正式开展，这是知名书画家唐湘子首次在家乡株洲举办个人书画展。

画展开展前夕，记者采访唐湘子，他说这个画展10年前就该办的，因为身体原因一拖便是十年，现在终于能向家乡做一次汇报。

成长

“书画是一门苦恼事，苦中有乐。”

唐湘子出生在茶陵县，父亲曾是一个教书先生，自幼喜爱书画，没事就写写画画。他也受到了家传熏陶，从小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高中毕业后，唐湘子离开家乡在北方空军某部服役，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书画的热爱，军事训练之余，经常拿笔书画，近30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他坚毅的品质。

“书画其实是一门苦差事，但对我来说，苦中有更多乐趣。”唐湘子坚持下来，他说，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上世纪80年代，他参加了北京书画业余学校国画班、书法班。该校授课的都是书画界大师级人物。后来，唐湘子先后到首都师范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技法得到进一步提升。

艺术

“大繁归简，画到最后，就是画修养。”

唐湘子画作兼具了北方画派的雄伟峻厚和江南画派的灵动秀丽。他擅国画山水，其画作大气且不乏细腻，灵动且不乏古朴，山水丛林之间充满着清新诗意。他的作品，画面与题款浑然天成、相得益彰。

“画家需要很高的综合素质，除了书法，还要懂得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诗词歌赋……只有把这些东西都融会贯通了，画作才有灵气，才能通过书画表达自我。”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采访中一直被唐湘子强调，他也是如是做的。

从艺几十年，唐湘子一直把“真”看作是最重要的东西。他说，只有真诚对待生活，热爱生活，才能发现美，才有创作的源泉。

故乡

“在外看过大山大河，不变的是对故乡的情。”

“故乡”在唐湘子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很多画作都取材于故乡的山水。

唐湘子说，家乡的山山水水，一直映在他心间，哪怕在外也不曾忘记过，每年都会回来看看。

随着年纪渐长，唐湘子对故乡越是眷恋、牵挂。“回到老家后，我去看看小时候玩的地方，看看家乡的变化。”唐湘子说，在外待久了，看过了华山、黄河等大山大河，发现以前觉得很高的山变矮了，以前觉得很宽的涨水，现在也不觉得宽了，“不变的是，我对家乡的情”。

“虽然以前总是惦念家乡，但是始终不从落笔。”唐湘子说，茶陵的山水不像张家界、黄山那么奇特，绘画性比较小，以前对家乡的山水缺乏思考，总是流于浮表，没有更深层的认识，创作也是一笔带过，没有冲击力甚至是自己满意的作品。

近几年来，唐湘子开始思考家乡的山水，还曾给茶陵八景写过诗歌，经常带着学生在家乡各地进行写生，创作出了一些作品，这次画展就有许多以家乡山水为题材的作品。

对话唐湘子

在家乡办画展，是我对家乡父老的艺术汇报

记者：为什么想在株洲办画展？

唐湘子：株洲是我的故乡，我一直期待办一次画展，本来10年前就该办了，因为我出了车祸，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画展被暂停，没想到一拖就是10年。

通过这次画展，我想对故乡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就我的艺术生涯做一次汇报。同时跟家乡的艺术家做艺术交流，带动家乡的文化艺术发展和繁荣，利用画展跟家乡的艺术爱好者进行互动、交流。

记者：今后，你在株洲有何打算和计划？

唐湘子：我在茶陵建了一个艺术创作基地，一方面培养家乡的书画爱好者，我会做一些公益书画培训，促进家乡的文化建设，同时建一个平台，请全国一些知名书画家来株洲、茶陵，给株洲的书画爱好者上上课。同时，我计划在株洲especially建一个艺术馆，届时我会将我一部分作品留在家乡。

记者：你是否给家乡的书画爱好者在艺术道路上提一些建议？

唐湘子：我认为他们首先要在书画的技法上下功夫，技法不到家就不能表现创作者的思想，思想就失去载体支撑。技法有了，创作者就要充实自己，提高修养，要思考生活、思考人生，让创作的笔触拥有更多的灵性。如果一个画家没有思想，只能是画匠，每天重复画同一个东西，看不到绿叶和森林。

艺术简历

唐湘子，又名唐永平、无悲、南岳居士，出生于茶陵。曾服役于空军，先后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为北京昌山画院院长，中国美术杂志副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学术委员，中国楹联书法艺委会委员，中国书画院艺委会秘书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

地名文化

清安铺：驿道四达交汇之村

丁 许

清安铺村位于醴陵市仙霞镇，北端和株洲县姚家坝乡(原属醴陵，1959年划出)的南田桥村、沈家桥村接界，距城区约22.5公里。地貌属海拔60-170米的低岗丘陵地带，是罗霄山系分支九岭山脉从浏阳向这里延伸的下降余脉。最高点为村北部的狮形岭，高170米。省馆珍藏著名文物商代青铜象尊，即在此山出土。

清安铺历史上素以驿道“四达交汇”而著称。驿道俗称“官路”，始于秦代建筑之“驰道”，以后历朝沿袭规模不一。宋元之际，醴陵驿制渐趋完备。南宋于县城设“县前驿”，位于“县治之右”。著名诗人范成大过醴陵曾作《咏醴陵驿》一诗，其中有句云：“绿水桥边县，门前柳已黄。”证明那时馆驿、县治及“绿水桥”均距隔不远。

元顺帝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各地奉诏令设立急递铺，专为官方传递文书。清安铺即为醴陵县城总铺下设的18分铺之一。东北至浏阳支线有王仙、明兰(南桥)两铺，全程70里；往东通江西为主干线有傅冲、插岭关(即老关)两铺，全程30里；主线往西北至省城长沙，有袁畲(即源门铺)、板杉、东冲、清安、梢岗(今属株洲姚家坝)、双畲(原属湘潭，和醴陵交界)六铺，全程60里；南往攸县茶陵支线，有龙山、西汾、樊岭等六铺，全程60里。另从清安铺主线折西南分支，跨“绿安桥”，有关王庙、绿口司两铺，全程50里。以上每铺配马2匹，驮铺卒3至6人不等，皆腰束革带，悬铃持枪，按限定时日向各铺依次传递。民国时始撤停。

驿道由官府依时拨款维修。其路面一般宽在2米左右，道心纵横铺列采自长沙丁字湾的条形麻石，两或三行不等，每块石料长约1米，宽约0.4米。穿山过岭，涉河修桥，工程巨大，民力耗费甚多。漫漫长途，时见600里加急文书鸡毛飞动，马蹄滴滴急如鼓点；“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天涯商旅，轿马奔驰，一串串驿铃清音俏然远逝，夕阳照古道余韵悠悠……

自近代航空交通，西风东渐，石板驿道遂成历史陈迹，且多不复存留。但它作为昨天的见证，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物资源。1999年冬，清安铺村委会发出倡议，号召村民捐款集资整修古道。共筹款4万余元，全村参与清沟铺石，历时一月有余。由上铺直至铺街，长约一华里的麻石古道基本恢复原貌，和沿街一些刻意保留的门廊以砖柱承撑檐亭的民居平房、商铺，和谐相映，颇有古朴之风。见多了面貌单一的水泥大道，从这样的对街走过，你不由会脚步轻轻，心中涌上一种莫名的敬畏。敬畏的是我们的祖先：那样坚毅、勤劳和纯朴。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性和血统，与脚下那些采自深山的厚厚石板，似乎都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你会遥想起曾在这村街上人山人海、熙攘涌聚的庙会墟集：充斥着油盐谷米、夏布药材，农副特产、杂耍戏班……就像先人们生生世世都只盼祈着的“清吉平安”，“清安铺”的得名，就来自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4个字，它表达的是一种深刻的生命顿悟和珍惜。在物质文明充裕的今天，这种对文化血脉的回归和珍重，尤值得人去提倡。

清安铺以交通之利得风气之先，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设立了新式小学堂；私立“兰谊中学”更享一时之誉，成为醴陵三中前身，这里曾走出过不少名人：清明廉干官任知府的张邦柱，革功起家加授提督的张拔萃，讨袁护法有功于民国的刘昆两建藩，晚年思归曾出主闽政的刘建绪……

而今清明盛世，清安铺古道悠悠依稀犹在，它联结明天，也呼唤人们：回顾昨天，记住昨天。

株洲有戏

离开了小凤仙，这样的蔡锷剧还有噱头吗？

张湘彦

2016年是蔡锷将军逝世一百周年，也是护国战争胜利一百周年。大型现代湘剧《护国》经过长期的提质打磨，于2017年6月开始在全国巡回演出。

日前，笔者有幸在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周末剧场观看了此一高水平的演出，现将一些粗浅的见解归纳如下，还请同道批评指正。

没有小凤仙，蔡锷与袁世凯能更好的双雄对峙

关于蔡锷其人其事，很多影视作品如《知音》、《逃之恋》、《蔡锷和小凤仙》等，都津津乐道于他和小凤仙的爱情故事，反而忽略了蔡锷的护国“大义”，淡化了护国的主题。而《护国》一剧一反俗套，演出了一个没有小凤仙的蔡锷剧。

该剧撷取了护国战争前夕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时刻，以蔡锷将军与袁世凯之间的周旋和斗争为主线，在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中展示了一个世纪前的风云变幻，并用湘剧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

舞台上的蔡锷与袁世凯，一个高洁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指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护国》中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斗智斗勇、双雄对峙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就让这部写历史的剧更加有看头，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护国战争这段历史，其实就是蔡锷将军真性情的体现，他的智智、他的爱国情怀在这段历史过程中得以展现。因此，蔡锷这个人物在舞台上的表演是需要层层递进的，与袁世凯斗智斗勇时，舞台上的蔡锷是内敛、抑止的，为的是伺机脱身；回到云南后，振臂一呼，“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这时候舞台上的蔡锷是开放、落气回肠的。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舞台上的调度以及演员情绪的饱和张力，能够带给现场观众强烈的感染力；这样一种英雄气概及其勇气的正面演绎，足以感动到更多的观众，足以让护国的历史得到回归，而不是机械地停留在蔡锷和小凤仙的野史趣闻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护国》一剧中的蔡锷将军，用他超乎常人的勇气、意志、智慧或者称之为力量的因素，得以延续和实现了普通观众的梦想和理想，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宽阔的阐释空间。

少了小凤仙，绝非美中不足，而是减少了干扰项，让剧情从“野史”回归到正途，跳出宫心计，走向恪落历史大局。

或许，这才是真正回归到了当年王心刚、张瑜那部红极一时的电影《知音》里，李谷一那首脍炙人口的同名主题歌所言：“我的是，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

没有将军拔剑南天起，何来的长风绕战旗。然也！

多了个蔡夫人，真实的蔡锷塑造渐入佳境

另一方面，如何突破对这段历史故事的熟知，打破观众对蔡锷波澜不惊的惯常期待，该剧在英雄题材的叙事上很好地做了诠释——写历史中真实的人。

换句话说，将英雄常人化，让人人皆可为英雄。观众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该剧努力表现了蔡锷内心的矛盾与煎熬，多层次地表现了他情感的丰富性。最终，他将忠诚献给国家，这一段历程的心灵挣扎与情感牺牲，展示了他作为一个英雄人物情感的丰富性、多向性和超越性。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普通的丈夫，他选择了牺牲小家成全大家，这个心路历程是非常痛苦的。该剧打破了常规，安排让蔡夫人出现在舞台之上，足见其有更加深意的表述，也可以说是还原了蔡锷这个人的本体。尤其是在最后一场，护国战争胜利之后的蔡锷，他对自我的反思与剖析，这段深层次的悲剧感足以让观众唏嘘不已。

据资料介绍，蔡锷与小凤仙的感情故事只是通过文艺创作不断地加以演绎丰富罢了，可以说是后人过度消费了小凤仙；实际上，蔡锷是一个家庭观念重且重情义的人，他与蔡夫人可谓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所以，该剧有意隐藏小凤仙，而首次选择蔡夫人的出场，是对真实历史的还原。除有如此，舞台上的蔡锷将军才既有真实美，又有理想美、人性美。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该剧对于蔡锷的思想转变，交代过于简单，这里面其实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蔡锷从云南北上进京，本是要协助袁世凯成就一番事业的，因对其帝制自为的失望而愤然“护国”，这一心理过程的斗争和激荡，在舞台上的演绎还不太明显，让观众看得还不够过瘾，进而使得整部剧还是有点脸谱化特征。

须知，在彼时，袁世凯被誉为“中国之第一华盛顿，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他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卖国贼而已；而且，梁启超、蔡锷、蔡百里、杨度等一时俊杰皆荟萃于京，当面对洪宪帝制，他们各自都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轨迹。这些人物之间有差异性、对立性，也具有共同的整体性、普遍性。如果只是简单地交代，无法在观众脑海里形成清晰可辨的人物个性特征，只能是看到宏大而模糊的历史群像而已。

尤其是梁启超与蔡锷之间的师生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护国之役，如果该剧能够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对个人命运进行追寻，让观众重新回归至历史的真实触感，或许更能打破常规，形成让人耳目一新、进而纠正历史错觉的宏大叙事效果。

《护国》剧照